

1012



五
與
文
史
資
料

第五輯

目 录

- 一、太滹烈士永垂不朽……………俞志杰 (1)
- 二、杰出的革命战士恽逸群……………顾雪雍 (3)
- 三、缅怀方丙宇同志……………俞志杰 (16)
- 四、怀念潘卜年同志……………储玉坤 (19)
- 五、青海高原埋忠骨——程秀山同志事迹
片断……………臻安 凡夫 祖德 (22)
- 六、悼念我国变压器行业的著名专家
——周茂培同志……………编辑组整理 (30)
- 七、朱凤美先生事略……………江苏省农业科学院
植保所病害研究室 (32)

纪念徐悲鸿先生逝世三十周年

- 八、悲鸿大师逝世三十周年祭……………徐 忻 (38)
- 九、卓越的才华 深刻的启示
——参观“徐悲鸿纪念馆”漫记……………黄养辉 (40)
- 十、怀念我国近代艺术大师徐悲鸿……………任敷孟 (48)
- 十一、永远怀念敬爱的悲鸿老师……………杨建侯 (56)
- 十二、抗战前本县公路始筑概况……………陈 真 (65)
- 十三、抗战胜利后县境内的公路与桥梁……………钱振蓉 (68)

- 十四、宜兴南山石灰窑业生产和经营的历
史概况……………路万里 周金松 白希贤(71)
- 十五、竹海之乡话毛竹……………冯洪法 丁华(76)
- 十六、解放前(1911—1949)宜兴中等教育
概况……………朱震华(81)
- 十七、桃李芬芳满天下 春风时雨永难忘
——记傅学文热心办学的光辉事迹
……………卢冠六(89)
- 十八、记抗日战争时期的苏美专宜兴分校
……………白丁 陶鹰(93)
- 十九、回忆宜兴戒烟医院……………钱挹青(95)
- 二十、宜兴著名眼科“三只眼”……………张伯纯(100)
- 二十一、流芳千古的周孝侯……………陈 真(102)
- 二十二、周孝侯遗迹……………廖 汀(105)
- 二十三、徐致靖父子与维新变法二三事……………徐培泽(109)
- 二十四、宜兴碑林(下)……………吴恩甲(118)
- 二十五、荆溪十景与徐达章……………韩其楼(125)
- 二十六、“天远堂”之由来及其它……………
……………邵伯棠 邵亦农(130)
- 二十七、重建海棠园记……………邵亦农(132)
- 二十八、西晋青瓷窑遗址……………谈鹤鸣(134)

- 二十九、张泽桥的历史变迁……………俞光远(136)
- 三十、东沅两灯楼……………俞光远(138)
- 施荡河口灯楼的由来
- 张泽矾灯楼
- 三十一、社戏……………晓方(141)
- 三十二、农历新年逛城隍庙琐忆
- 二十年代初宜兴风情画一角
- ……………储建冰(146)
- 三十三、说三害——烟·赌·娼……………旋声(152)
- 补白七篇

太湖烈士永垂不朽

俞志杰

宜兴素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，早于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举行了闻名省内外的农民暴动，由于敌我力量悬殊，占领宣城三天后撤出；万益、蒋三大、陈伯祺等同志在辗转山区途中，遭敌人逮捕后壮烈牺牲。他们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，在宜兴的革命斗争史上，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，并对宜兴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产生了极为深远的积极影响。

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，我们为了开辟游击根据地，发动群众，打击敌人，即以宜兴为中心，武进和无锡沪宁铁路以南，苏州吴县以西，以及金坛、溧阳与宜兴接壤的边沿地区，成立太湖地区（即东到太湖西至溧湖）。在中共太湖地委领导下，依靠群众、组织和发展武装，对敌作长期不懈的英勇斗争，无数优秀的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，为了民族解放事业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

太湖地区的党、政、军都是在宜兴群众基础较好的闸口一带建立的。当时谭震林同志来太湖地区检查指导工作，就是在闸口邵姓祠堂里作报告的。我们的部队到苏西、锡南活动时，天天打仗，甚至一天几次战斗，伤员都运送到宜兴闸口一带，安置在群众家里医治养伤；我们的部队也只能回闸口一带进行整休。1943年，在南面山区开辟游击根据地，范围扩展到浙江的长兴，安徽的郎溪、广德，更是以宜兴为中

心了。这一事实，在太滬地区工作过的同志都一致公认的。

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坚持在宜兴的徐行同志，1949年解放后，任中共宜兴县委书记，深感胜利来之不易，这与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英勇战斗、流血牺牲是分不开的，于是在西氾边建立了“太滬烈士纪念馆”，以资我们这些活着的同志永远怀念！当时常州专区专员张志强、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都亲笔为“太滬烈士纪念馆”题了词。但在十年浩劫中，由于林彪、四人帮反革命的肆意破坏，颠倒是非，混淆黑白，“太滬烈士纪念馆”也未能幸免而被砸碎了。

烈士用鲜血换来的胜利，人民群众是不会忘记的，于1974年重建了“太滬烈士纪念馆”，并在1979年竣工落成“太滬烈士纪念馆”，在这年的清明节，过去在太滬地区工作过的领导和许多老同志，都来宜参加“太滬烈士纪念馆”开馆典礼，凭吊革命先烈，瞻仰先烈遗容和回忆革命事迹。

饮水思源，翻身不忘共产党。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，在“太滬烈士纪念馆”前，举行新团员入团、新队员入队仪式，他们宣誓：决心以革命先烈的大无畏精神，努力学习，踏着先烈的足迹，为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祖国作出贡献。

每年的清明节，全县许多学校师生和工农群众、干部都来“太滬烈士纪念馆”前凭吊，并瞻仰烈士纪念馆。

“太滬烈士纪念馆”和“太滬烈士纪念馆”，昭示着先烈的光辉业绩，它与天地共存，日月同光，激励我们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进行到底！

杰出的革命战士恽逸群

顾雪雍

编者按：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，蒋介石叛变革命，白色恐怖笼罩全国。其时，恽逸群同志在党的指示下，组织了吴中一、王听楼、张志翔、陈宝楨、周华、董顺、周国瑾、周至行和蒋佛影等来宜兴协助党组织开展工作。他们在横山对农会会员进行减租减息的教育和军事训练，并领导农民同地主、高利贷者和芙蓉寺和尚作斗争。

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，在党组织领导下，宜兴农民举行暴动。由于敌我力量悬殊，不得不撤退，在转移途中，领导人万益等数人被捕，壮烈牺牲；党组织遭受巨大损失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白色恐怖更为严重。恽逸群同志就是在这样险恶的情况下，于一九二八年十月担任中共宜兴县委书记，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，总结经验教训，增强党员和基本群众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心。他于一九二九年七月调离，虽前后只十个月时间，但为党做了关键性的工作，他的贡献已载入宜兴革命斗争史册，永垂不朽！

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恽逸群同志，在他五十多年的战斗生涯中，为党和革命事业建立了功绩，为人民的新闻、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。贯穿在他一生的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品质，值得我们好好学习。

科学救国幻想破灭

恽逸群原名钥勋，字长安，1905年1月24日生于江苏武进县上店镇寿山村。先世六代为医，其父恽兆冈改业塾师，后转入仕途为候补县丞，擅书画，急公好义，胆识过人，为各方器重。恽逸群天资敏慧，四岁入塾读书，十四岁已通读经史。他读了梁启超等革新派的“时文”，努力追求新知识，考入上海大同大学数理专修科，决心将来振兴实业，走“科学救国”的道路。由于家境衰落，他被迫辍学，进入无锡电话公司当技术员。1925年“五卅惨案”打破了他“科学救国”的梦想，于是他毅然辞去工资较高的工作，到上海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，随即参加了国民党，回本县进行宣传、组织活动，后来又在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负责人侯绍裘、乔心全（均为中共党员）的影响下，认识到只有共产主义能够救中国，遂于1927年参加了共产党。

投入革命斗争

从此，他整天奔波着发展组织、进行共产主义宣传，虽生活贫困，却一次次谢绝了有钱有势的亲戚给他谋职的机会。他的舅父是军阀孙传芳的驻沪办事处长，一次特“屈尊”去看他，他却避而不见，说：“我就是看不起有钱有势的人！”1927年春，北伐军攻入江苏，他和战友们发动罢工罢课，组织工人、学生三千人打开城门，列队示威游行，随即以国民党县党部常委的身份，接收政权，开始新生活的建设：斗争土豪劣绅；发展工会、农会，改善工农生活；禁烟禁赌；提倡男女平等。城乡一片热气腾腾。

蒋介石“四·一二”政变后，恽逸群继续坚持革命斗争，并把家中田地数十亩抵押和借款共约一千银元，开办逸仙中学作党的地下据点，培植革命力量。当时有人讽刺他：“卖田借债干革命，长安真是书呆子！”他不为所动，并担任了中共县委书记。在白色恐怖中，他被反动派逮捕解送南京，经亲友多方营救才出狱。出狱后，又回县发动农民组织农会，开展蓬勃的抗租、减租斗争。1928年10月，他调任中共宜兴县委书记，1929年7月他转到浙江肖山湘湖师范学校任教，并先后担任中共肖山县委书记、浙江特委秘书长。在肖山时，他在学校和农村建立了十六、七个党支部，党员从五十人发展到一百多人；他采购大量马列主义书籍，组织学生阅读，发动学生开展社会调查，发动农民进行“吃大户”、抗租减租等斗争，使革命力量迅速壮大。

新闻战线的战将

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，江苏省委遭到五次大破坏，恽逸群和党失掉了联系。怎样为党继续工作呢？他毅然投入新闻战线。

1932年他进入上海最大的民营通讯社——新声通讯社任记者，曾深入长江中下游的安庆、汉口、沙市各地，采访洪水后的救灾工作。当了解到国民党把用救灾名义借来的“棉麦借款”大量贪污，并移作剿共经费的罪恶行径后，即撰文揭露，使国民党十分狼狈。

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东北沦陷后，华北岌岌可危。国民党在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反动方针指导下，步步退让；对共产党和进步文化界则加紧“军事围剿”、“文化围剿”。

恽逸群在进入《立报》担任编辑、主笔，和以后在邹韬奋主办的香港《生活日报》、《生活星期刊》任编辑期间，不断撰文抨击蒋介石政府的反动政策，大声疾呼团结抗日，为此他还和马相伯、沈钧儒、陶行知、邹韬奋等一起发起成立“上海文化界救国会”，列名《宣言》，呼吁“停止一切内战”、“释放一切政治犯，共赴国难”。他以该会新闻干事和上海新闻界联谊会、上海文化界联合会理事名义，积极推动新闻、文化界的救亡活动。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，苏南沦陷，上海租界成为“孤岛”，英美法租界当局对中文报刊稿件进行检查，《立报》、《申报》、《大公报》等纷纷停刊迁往香港。恽逸群留在上海恶劣的环境中坚持斗争。他进入挂美商招牌的《大美报》任编辑。不久竟在上海用英商招牌出版《导报》、《译报》，他又分别担任主笔、总编辑，除为两报写社论外，还为《大美报》、《华美晨报》组织全部社论，为《循环报》组织部分社论。在这些日子里，他几乎每天要写两篇社论或文章。尽管每天都有被暗杀的危险，但他置个人安危于度外，夜以继日地工作。他呼吁坚持团结抗战，分析抗战必胜、日帝必败的道理，揭露日帝亡华阴谋和汉奸的卖国理论，极大地鼓舞了“孤岛”和东南沿海沦陷区广大人民的抗日热情。

卓越的政治家

恽逸群撰写的大量政论文章，短小精悍，笔锋犀利，逻辑严密。由于他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，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，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，洞察事物的本质，因而见解精辟，分析深刻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
由于他观察敏锐、深刻，他的政论曾有两次在当时舆论界博得“慧星”的称誉。一次是：1936年12月12日的“西安事变”，当时真相不明，谣诼纷起。日本报纸指责苏联搞阴谋；苏联报纸指责张学良、杨虎城搞反动政变；英美通讯社则散播蒋介石被杀的谣言。日帝为挑起中国人民自相残杀，宣布停止向察绥进军，国民党亲日派何应钦立即组织“讨逆军”向西安进发，眼见大规模内战难以避免，全国人心惶惶。面对这种复杂、紧张的形势，当时任《立报》主编的恽逸群连续发表评论，通过分析，大胆提出论断：“西安事变”有和平解决的可能，中国决不会变成西班牙第二。这些言论对稳定人心，鼓舞抗日情绪起了很大作用。从此，《立报》的言论被认为是中国人民舆论的代表。上海塔斯社奉命每天把《立报》评论用电报发回莫斯科。

另一次是：在抗战开始前后，汪精卫一再散布“抗战必败”的悲观论调。1938年11月他逃离重庆，在越南河内发表“中日和平”的声明，恽逸群随即在上海《导报》发表《异哉汪精卫之言》的社论严加挞伐。在社论中，他严斥汪的言论和老牌汉奸王克敏、梁鸿志如出一辙。这些高瞻远瞩、言人所不敢言的文章，使恽逸群作为卓越的政治家而声誉鹊起。

进行“韧性的战斗”

1937年初，他在上海报纸上一再撰文抨击国民党的反动政策，国民党令上海特务机关对他绑架暗害，他得到有关方面通知后，立即到一个朋友家躲藏。那个朋友是上海大流氓头子黄金荣的门徒，家住法租界总巡捕房对面。那个朋友每

天伴送他坐小汽车上下班，使国民党特务不敢下毒手。抗日战争期间，日伪在上海大搞白色恐怖，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、妇女界领袖茅丽英等被枪杀，恽逸群被日伪列入黑名单的前列。在这些日子里，他经常迁移住处，继续用笔向敌人冲杀，表现了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。1939年夏衍在桂林写作剧本《心防》，反映上海文化工作者艰苦的地下斗争情况，剧中主人公——新闻记者刘浩如，怀揣遗囑，随时准备牺牲，利用各种社会关系，坚持顽强的斗争，其原型就是恽逸群同志。

在他出生入死的危急关头，党通知他转移香港。他在香港主持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。当时许多民主党派和进步文化界人士因蒋帮迫害而避居香港，他根据党的指示积极开展统战工作。1941年5月，他和邹韬奋、茅盾、金仲华、范长江等九人联合发表《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》，痛斥国民党对日投降妥协的阴谋和对进步文化事业的摧残。在太平洋战争发生、香港沦陷后，他奉命撤退到敌占区的上海，在潘汉年同志领导下，打入汉奸报《新中国报》和日本特务机关“岩井公馆”，为党收集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，同时根据党的指示，用隐晦曲折的笔法，在汉奸报刊撰文批驳日伪的反动言论，揭露蒋介石的反动面目。1944年10月，他终于被日本宪兵队逮捕，备受酷刑，直到日本投降前夕才获释放。

日本投降后，他进入苏北解放区，先后担任新华社华中分社、《新华日报》、《新民主报》、《大众日报》等报社社长、总编辑。解放以后担任上海《解放日报》总编辑、社长和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。在党的新闻领导岗位上，他为党的宣传事业，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心血。

多方面的才能

恽逸群作为杰出的新闻记者，对我国新闻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。抗战前，他和上海许多新闻记者一起举行经常性的“记者座谈”，并编辑《大美晚报》的《记者座谈》副刊。他和范长江、夏衍、陆诒、石西民等发起成立“中国青年记者学会”，团结教育了广大青年记者。他兼任香港、上海、解放区等各地新闻院校的院长、校长、系主任，教授，培养了大批新闻干部。他著的《新闻学讲话》，曾是解放区新闻干部业务学习的教科书。

他渊博的学识和精湛的新闻工作技能，也是广大新闻工作者学习的榜样。他对中外历史上许多事件、典故、人物如数家珍，有“活词典”、“百科全书”之称。解放战争中，新华社公布国民党战犯七十多人的名单，当时他在山东《新民主报》工作，因无资料可查，他就凭记忆把这七十多人的履历、派系等情况逐个写出，第二天见报，解放区报纸纷纷转载，在新闻界一时传为美谈。

威武不屈 坚持革命

恽逸群在旧社会坐过两次牢，多次逃过了生命危险，为新中国的建立历尽艰辛，解放后照理应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，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大贡献，可是他碰到的却是一个又一个的打击。在1952年三反运动中，他工作中的某些缺点被夸大歪曲，无限上纲，在不调查核实、不准申辩的情况下，把他开除党籍，贬为地图出版社、辞书出版社副总编辑；1955年又因潘汉年案的牵连入狱十一年之久。

但他始终坚持革命立场，毫不动摇。以潘汉年案件来说，抗日战争时期，他打入敌伪机关工作是党给的任务，在敌伪报刊上写文章，他多采用隐晦曲折的笔法，“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”，但这些都成了所谓“反革命”的罪证。恽逸群后来在申诉书中说：“按照公检法办案人所持理由，似乎他们所遵循的原则是：甲、只准敌人派遣奸细打进革命阵营来，不准革命阵营派人打进敌人那里去，否则就是投敌；乙、打进敌人内部，不准为敌人做任何事，不准照敌人的口吻谈话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应该暴露身份让敌人杀害才好，否则就构成反革命罪。按照这个逻辑，则敌人派进来的奸细干过不少‘革命’事，说过无数‘革命’话，有的还干得很出色，自然应该算作‘革命’功臣了！这是什么立场？是什么人规定的？”这些话是对极左路线的控拆。许多革命老干部特别是白区地下工作者受到的不幸遭遇，应该作惨痛的教训永远记取！

1965年冬他被释放出狱后，派到江苏阜宁中学图书馆任管理员，只给一些生活费。不久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他又受到更残酷的迫害。作为“专政对象”，他天天挂牌示众；罚做冲刷厕所、小工等种种劳役；经常挨斗、陪斗；被关进白天也不见阳光、阴风飕飕的“牛棚”；写不完的检讨；每天还要应付川流不息的外调人员的盘问，几年中写了五十万字的外调材料；……他受尽一切非人的折磨，逐渐得了沉重的肺气肿、哮喘病，冬天更是辗转床褥，无人照料。这个年逾花甲的病残老人的生命之火，眼看快要被狂风暴雨吹灭了。但在这个看来已经绝望的时刻，他没有颓丧，依然怀着对党的坚定信念，默默地拿起笔来继续战斗。他经常就国计民生问题向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宝贵建议，他在这些信中说：“深感平日在党内侃侃直陈，触人痛疮，当引以为

戒，但本性难改，……终认为隐瞒自己的认识和见解，即为对党的不忠实……”，“文化大革命中怪论层出，忧心如捣……终不甘也不忍袖手旁观”，“平日耻为乡愿，不惯于趋合潮流，荣辱祸福，久置度外，……苟于党于民有毫发之益，则摩顶放踵，亦所不吝……”。

正因为他对党赤胆忠心，所以他在乌云翻滚的十年内乱中，一再向党和人民大声疾呼，批评党的严重的“左”倾错误，并同林彪、江青、康生一伙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：

——他见《毛主席语录》满天飞，便写信给中央领导人，对林彪别有用心地炮制的该书的《再版前言》表示“深感不安”，认为“武器（指理论）可以杀敌人，也可以杀朋友，杀自己兄弟，也可以自杀的。”后来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利用毛主席的片言只语来制造武斗，杀害革命老干部和群众的血腥事实，证明他的话是正确的。

——他针对林彪、江青、康生掀起的个人崇拜恶浪，写了《平凡的真理》，对个人崇拜产生的根源和危害作了透彻的分析，指出：“凡是把国家最高领导人神化的，必定有奸人弄权，阴谋篡夺权力，这是古今中外绝无例外的普遍规律。只有极端糊涂的人，甚至接近白痴的人才会相信自己是天生的圣人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知，不会错误，不会受人蒙蔽愚弄，因此受奸人的愚弄，至死不悟。”历史已证明他的见解是何等的精辟、正确。

——他针对“四人帮”的恶劣文风，写了杂文《论新八股》，认为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出现的一种新文体，不论什么内容，首先引用几句领袖的话，然后再入本题，以下每一段又引用一二句领袖的话再加发挥，以所论述的事情来证实领袖的理论而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，是十足的“代圣立言”，

是一种“新八股”的歪风，是继戊戌变法、五四运动以后老八股几次复辟的又一次“借尸还魂”，从而彻底揭露了这种文风的封建反动性。

——1970年他向党中央领导同志提出《关于加速工业化的建议》，列举“文化大革命”以来经济凋敝，民生疾苦，党员干部政治经济地位特殊化、严重脱离群众等事例，建议从制度上着手改进党风，征收个人所得税，提高农民生活，……他的这些建议和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政策完全相符。

……

在史无前例的“文革”时代，这些信件、文章都可使他遭到杀身之祸，但他所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安危，而是党和国家的命运。甚至当他辗转病榻的时候，他还在向阜宁中学的老师呼唤：“我的病不要紧，可是国家怎么好啊！别人不知道江青的底细，她要做皇帝啦！”“现在的报纸都在撒谎，他们是欺骗人民啊！”面对派来监视他的“造反派”，他响亮地告诉他们：“我的观点就是这样，你们看着办吧！”这些言行反映了他忧国忧民的胸怀，刚直不阿的品德，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斗争到底的精神，真是“正气贯长虹”啊！

“四人帮”被打倒后，恽逸群恢复了自由。根据他的专长，党中央安排他到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担任近代史研究工作。

对历史学的贡献

恽逸群既是卓越的记者，又是卓越的历史学者。恽逸群自幼爱好史学，对中国历史有深厚的根底，担任新闻记者以后，他又结合自己的工作，对近现代史不断探索研究。他曾

把“五四”以来军、政、财经各界的知名人物分门别类收集了相当丰富的资料。他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各派系的政治内幕尤其熟悉，但在紧张的新闻活动和政治斗争中，他没有能写出系统的著作，只是在1938年由于政治形势的需要，写了《外蒙问题的考察》和《抗战国际知识》出版。以后由于反动派的迫害和战乱，辛苦积累的资料全部失落了。尽管如此，他仍在百忙中凭他惊人的记忆力，陆续写出一些以人物传为主的历史作品。1940年写了《吴佩孚评传》，1942年以后陆续发表了《中国内幕异闻录》（包括邓演达、张一麟、张公权与宋汉章、戴传贤、陶希圣等人物）、《杜月笙论》、《虞洽卿论》、《黄炎培论》、《闻兰亭论》、《胡适的一生》、《上海史话》等。1948年在山东解放区出版的《蒋党真相》，则是份量较重、影响较大的作品，至今仍被史学家认为是研究民国史的重要资料。

他很赞赏司马迁的史笔。他一方面继承了古代史家“秉笔直书”的优良传统，同时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、立场、方法，爱憎分明地对历史人物作出客观、公正的评价。他不抹杀反面人物的长处，也不掩饰正面人物的缺点——一切还他本来的面目。例如他写杜月笙怎样依靠烟赌发迹，怎样操纵政治，参与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也写他礼贤下士、交结各方，说他颇有一些郭解（春秋时的侠盗）的作风。他写上海商界领袖虞洽卿早年怎样组织罢工、罢市，和帝国主义作斗争，怎样创办实业，发展民族资本，也写他怎样和帝国主义妥协，代表帝国主义用六千万元收买蒋介石，说他：“成功之处也就是他的失败点，失败的事情在另一观点上看也可以说是成功的。”在许多作品中，都反映了他这种辩证观点的深刻分析，没有一点教条主义的痕迹，使人看了感到